

第三编 全民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

第六章 党组织的重建和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合浦地方组织的重建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局势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以演习为名，向驻北平卢沟桥的中国军队突然发起进攻，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始。

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同时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部队做好开赴前线的准备，党的各级地方组织和党员积极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7月15日，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进一步推动全国抗战，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将《中共中央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主张，声明中国共产党愿意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执行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强调只有中华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共中央希望以宣言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全国各族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支援前线的热潮。在外敌紧迫和人民群众要求团结抗战的压力下，国民党最高领导层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建议，实现团结抗日。7月底，平津失陷，日军大肆进犯华北各地；8月13日日军在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抢占有利据点，并向中国军队进攻，直接威胁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京沪警备司令官张治中率部抗击，空军也出动参战。淞沪战役的开始彻底打破了国民政府想通过外交途径求得和平解决所谓“局部事件”的希望。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日本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8月20日，国民政府颁发战争指导方案，全国划为5个战区，其中福建、广东为第四战区，总部设在广州。8月上旬，国共双方经艰难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并设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与此同时，国共双方还就散布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

军)的具体事项展开了谈判。9月22日,国民党中央以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形式,宣告国共合作的成立。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中共的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国共合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热烈欢迎,推动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但是,由于所代表的根本利益和指导思想不同,国共两党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从一开始就存在严重的分歧,形成两条截然不同的抗战路线。国民党不愿放弃一党专政,力图使抗战的发展不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因而主张采取单纯由政府 and 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对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实行多方面限制和压迫,并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的根本改革。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一条全面抗战路线,主张放手发动群众,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这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必然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因此,存在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的斗争贯穿抗日战争的全过程。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讨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抗日战争,实行全面持久的方针,进一步确定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制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指明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这是与国民党所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完全不同的正确的抗战路线。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公然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抗日救亡的浪潮席卷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纷纷行动起来,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民族抗日的主张。工人、农民、学生以及教育界、文艺界、宗教界、妇女界、工商界等纷纷建立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组织,进行抗日宣传、为前线将士捐赠物资、认购救国公债等,以各种方式支援抗战。上海、北平、天津、武汉等大中城市的工人群众还组织抗日义勇队、宣传队,支援前线,参军参战。

在广东,当局在抗日大势和广大人民的抗日要求下,对抗日的态度有所变化,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7月17日成立“广东民众御侮救亡会”,并组织7万多人举行火炬大游行。广州各界民众15万人参加了抗日示威大游行。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布置广州、香港等地党组织:“发动所有组织参加‘广东民众御侮救亡会’,于最短期间内成立各界分会或支分会”;广泛动员群众“组织北上慰劳队、救护队、战地服务团、抗敌后援会、抗日先锋队等团体,发动募捐,援助华北抗战”,并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口号,如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们立即行动起来参加御侮;在御侮的抗战主张下,把全广东的民众组织起来;要求北上抗日,参加华北抗战;实施广东防务建设,保护广东安全;开放民众抗敌运动,释放政治犯等,有力地推动抗日救亡运动逐步高涨。

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热潮,特别是广州、香港等地各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就影

响到地处广东南路的钦廉四属地区。在钦廉四属中心的合浦，广大爱国青年、学生和民众，纷纷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大潮中。廉州中学，合浦一中、合浦五中（现公馆中学）、合浦三中（现南康中学）、寨圩简易师范等学校组织抗战宣传队，用演剧、歌咏、漫画、标语、演说、壁报及民众夜校等形式开展抗日宣传。廉州及北海文化界组织烽火剧团、海燕剧团和大众剧团，演出话剧《放下你的鞭子》《太原酒家》，演唱《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爱国歌曲，动员民众共御外侮。廉州中学、合浦一中宣传队除经常在廉州、北海街头和附近农村、渔村宣传外，还前往县属的主要圩镇宣传。同时，各区乡学校及圩镇青年也纷纷组织抗日宣传队，抗日救国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

9月，李英敏等在廉州集股开办“战时读物供应社”，大量出售马列著作和抗日救亡书报。12月，郭李晁（郭芳）、卢传义等在北海开设“吴家园图书室”，很多青年学生在此阅读马列著作和进步报刊。书店和图书室广泛地传播马列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10月，北海吴世光、庞自、刘雨帆等出版《战声》三日报，报道全国抗日消息，撰文批驳国民党当局散布的“速胜论”和“亡国论”等谬论，传播抗日救国思想。在这时期，抗日救亡运动在合浦迅速兴起，并成为社会活动的主要潮流。随着这一运动的发展，中共的政治主张得到广泛的传播，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日益增强，客观上为合浦地方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创造了有利条件。

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

抗日战争的残酷性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杂性，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加重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责任”。1937年抗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主要集中在红军中和陕甘宁边区及其他一些小块根据地，在全国范围内，党的力量还很弱小，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大多数党组织被破坏，许多地区只剩下零星的党员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坚持斗争。这种状况，很难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和抗日斗争的需要。为此，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应根据形势的变化，结合当前的实际，改变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在巩固和扩大党的秘密组织的同时，用一切方法争取党的公开与半公开，发展党的组织。1937年8月，中共中央陕北洛川会议提出为加强党对各地抗日运动的领导，应尽快恢复、建立被破坏的党的各级组织，重建各省委领导机关。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任务，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中共中央关于恢复和重建党的各级组织、大量的发展党员的一系列决议下达后，各地党组织都把恢复、重建组织和发展党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队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1937年10月，张文彬受中央委派到广东后，撤销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工委），成立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南工委），张文彬任书记，任务是迅速恢复

和发展广东党组织，建立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抗日团体，发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国共合作，进行抗日战争。1938年4月，中共南工委撤销，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张文彬任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分析广东的抗日形势，根据中央《关于发展党员的决议》和长江局要求广东党组织发展五倍党员的指示，制定了广东党组织工作的总方针：在抗战的过程中埋头苦干，切实积聚力量，确切地建立强大的群众性的党的实力，准备在敌人进攻华南与持久战进入最后阶段时，广东能有力量积极参加保卫华南的战争。会议决定集中力量抓党的建设，以建党为中心，一切工作以党组织的结果为目的。党组织的重点工作任务是建党工作，由点到面地发展。

1937年，中共广东省组织先后派共产党员张进煊、赵世尧回合浦开展党的工作。张进煊是合浦县白沙乡人，1936年6月在中山大学读书时，经中山大学学生运动领导人钱兴介绍，加入“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简称“中青”），并担任该组织所办的《时事周刊》的编辑，其任务是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指导青年斗争。这时，“中青”已成为中山大学和广东抗日运动的中坚力量。张进煊回到合浦后，就如何搞好建党工作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根据当时的情况，认为，张进煊为白沙人，对公馆、白沙地方乡土情况熟悉，社会关系好，开展工作有许多便利条件；公馆、白沙地区又是地主官僚比较集中的地方，人民群众遭受的剥削和压迫相当严重，生活极度贫困，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反抗地主阶级的精神较强烈，容易接受革命思想；公馆、白沙地区的地理位置也相当重要，它背山临海，水陆交通比较方便，与博白、廉江接壤，靠近广州湾，是合浦通往广州的必经陆路，便于与党的上级组织联系；公馆、白沙同是一个区（公馆区），在公馆区重建党组织，取得经验后向全县推广，把党组织向全合浦发展是比较可行的。正当考虑这个问题时，合浦五中校长石端向他发出聘书，聘任他为五中教导主任，张进煊接受五中校长石端的聘请。石端是一位同情共产党的进步人士，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曾经受过革命思想的熏陶，张进煊认为在五中进行革命活动应该是可靠的。于是他不但接受聘请，还安排李英敏到五中附小任教导主任，一同以教书做掩护，开展重建党组织的准备工作，李英敏当时是“中国青年抗日同盟”成员。张进煊、李英敏到合浦五中后，便积极发动学生，大搞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校内发动各班出墙报；每逢圩日组织学生上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校内成立读书会，组织积极分子学习进步书刊，以此提高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的革命思想。他们通过这一系列活动，物色对象，进一步加强教育。1937年春夏之间，发展和吸收了张九匡等一批先进青年加入“中青”，建立“中青”小组。同时，李英敏由张进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经广州党组织批准）。下半年，张进煊调任中共广州外县工委委员，离开合浦。

1938年2月，中共广州外县工委再次派张进煊回合浦开展重建党组织的工作。张进煊回到合浦后，在省立廉州中学任教，到任后，随即通知李英敏到廉中附小任职。

赵世尧在北海“九三”事件后，为了避开国民党军一五九师的追捕，于1936年10月

到广州。同月，由当时在广州的符荣业介绍入党。赵世尧在广州，介绍在燕塘军校学习的李俊山等人入党。1937年11月，中共广州市委外县工作委员会动员他回北海工作，介绍他到香港，见到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文彬。张文彬和他谈了3次，强调发展党员要保证政治可靠，要把抗日、民主革命思想提高到共产主义思想的水平，具有坚强的党性和组织纪律性，有坚强的革命气节，把党建成工人阶级的先进队伍，要注意向农民和农村发展。12月，赵世尧回到北海，了解情况和安排好工作以后，又到香港向领导汇报，得到指示后，1938年2月再度回到北海，进行重建北海党组织的工作。当时，合浦的抗日救亡运动正在蓬勃发展，赵世尧回乡后很受欢迎，因为他过去在北海青年学生中做了很多工作，威望较高。他推动北海各界建立“抗敌后援会”，并任总干事，以此为立足点开展工作，通过接近他的人了解合浦和北海的情况，物色积极分子，开始重建党组织的筹备工作。

赵世尧和张进焯在廉州研究重建党组织的工作。决定由张进焯、赵世尧、李英敏成立一个党支部，支部各人分别在廉州、北海发展党的组织。3人分工：张进焯在廉中、李英敏在廉州镇、赵世尧在合浦一中和北海、西场同时发展一批党员。张进焯在廉中发展钟高鉴、孙业炳、张文纲，同时还在公馆发展张九匡等。李英敏在廉州镇发展伍雍娴、岑月英、李华良等。赵世尧在合浦一中发展了庞自、郭芳（郭李晃）、谢王岗（谢祖佑）等，在社会抗日救亡团体中发展黄人善、王文崑、周志刚等，还在西场发展了罗刚等。随后又陆续发展：在合浦一中由庞自发展宋家培、李焯兴（李山）等，由郭芳发展卢传义、利培源等加入党组织，并建立合浦一中党小组；在西场由罗刚发展朱明、王克、黄模、王思贤等，并建立西场党小组。党员队伍壮大，党的基层组织增加，终于把中断11年的合浦地区党组织重新建立起来。

1938年3月，中共广东省委派周楠到合浦检查工作，主要是了解合浦地区重建党组织工作和开展抗日救国群众运动的情况，并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的精神以及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国群众运动、建立党的组织等问题的意见。

4月，张进焯到广州汇报工作后返回合浦，在廉州阜民南路“有生号”召集全体党员开会，传达广东省委派张进焯负责合浦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宣布成立中共合浦特别支部，张进焯任书记，赵世尧、何世权任委员。会议决定张进焯、何世权负责廉州、西场等地党组织工作，赵世尧负责北海党组织的工作。特支机关设在廉州阜民南路“有生号”。特支建立后，积极培养发展党员，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上层人士和各界民众，掀起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宣传队伍遍及全县城乡。

8月，广东省委动员各校大学生党员回家乡从事建党工作。在广州读书的陈任生、韩瑶初受广东省委委派回家乡合浦县工作。陈、韩回到合浦后，即在廉州召开合浦特支扩大会议。扩大会上，韩瑶初传达中共广东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确定的建党精神和工作总方针、广东省委关于华南政治形势与任务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陈任生传达省委关

于组织工作的意见。会议决定扩大特别支部，加强党的领导骨干。具体分工为：书记张进焯，组织委员陈任生，宣传委员何世权；韩瑶初负责青年学生工作，赵世尧负责统战工作。陈任生还任广东省抗日先锋队驻南路办事处主任。在这次扩大会议上，决定增建廉州中学党支部和北海党支部。派朱兰清、许家骅、邱鸿就到白石水区柑子根小学教书，建立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朱兰清任书记，在农村发展党组织。

10月下旬，广州沦陷，广东省委根据抗战形势的重大变化，需要迅速开辟南路钦廉四属抗日游击根据地。为了加强合浦地区党的领导力量，开辟钦廉地区抗日根据地，中共广东省委指示尽快成立合浦县工作委员会，并派中共西南特委组织部部长周楠到合浦组建中共合浦县工委。同时派邹贞业、张世聪、陈业昌等从广州回合浦工作，增强党领导骨干。这批人回合浦后，中共合浦特支派张世聪任白石水党支部书记（朱兰清任组织委员），大力发展农村党员；陈业昌任寨圩党支部书记，领导寨圩简易师范学校师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派邹贞业到公馆工作。为了壮大党的力量，先后在廉州、北海、西场、公馆、白石水和寨圩建立党支部。到11月，已经发展党员96人。

11月，周楠到合浦，在北海中山东路朝阳里“桂园”主持召开中共合浦特支扩大会议。张进焯、陈任生、赵世尧、韩瑶初、何世权、张世聪、郭芳、张书坚、王文崑、张九匡、利培源、林朗天、罗刚、伍雍娴等出席会议。会上，张进焯、韩瑶初和赵世尧分别作工作汇报。周楠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指示，指出日军可能随时在广东沿海登陆进犯中国，合浦有沦为敌占区的危险，合浦必须迅速准备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为此，合浦要加强党的力量，决定成立中共合浦县工作委员会。中共合浦县工委就在这次会议上产生，书记张进焯，组织部部长陈任生，宣传部部长何世权，武装部部长赵世尧，青年部部长韩瑶初，妇女部部长伍雍娴，候补委员张世聪等，县工委机关驻地仍在廉州阜民南路“有生号”。

中共合浦县工委成立后，增强了党的领导，积极准备建立抗日根据地，在派出一批党员骨干加强山区农村党组织工作的同时，还在国民党一五九师政工队和合浦一中高中学生恩平集训队分别增建党支部。至1938年底，合浦全县共有党支部10个，分别是廉州、北海、廉中、一中、西场、公馆、白石水、寨圩、一五九师政工队、合浦一中高中学生恩平集训队等党支部，另外还有若干个党小组，此时的党员已发展到100多人，原学生读书会的骨干和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大都先后加入了党组织。这是一支坚强的队伍，标志着合浦党组织的重建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已建立起完整的集体领导机构和遍及全县重点线的党群组织。

中共合浦县工委把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点放在合浦北部山区，推动廉州中学和合浦一中分校迁址小江，大批党员向北部转移，加强山区工作，为建立抗日武装作准备。11月，派在合浦一中读书的灵山籍党员黄文法回灵山做开展工作。

1939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为加强南路工作，会议决定成

立高雷工作委员会，旨在领导高雷地区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开展统战工作，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为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提供了最重要的组织保证。高雷工委成立后不久，日军占据合浦的涠洲岛，并在岛上修建飞机场，作为进犯中国华南和西南的空军基地。随后海南岛也被日本占领。鉴于这一严峻形势，中共广东省委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决定加强粤西钦廉地区党的领导，以合浦为中心，把钦廉四属的抗日武装力量整合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于是决定把中共合浦县工委扩建为中心县委。1939年初，中共广东省委通过东南特派李士洋（李永泉、姚永光）回合浦筹建中心县委。2月，李士洋回到合浦，在廉州石桥街李屋主持召开中共合浦县工委扩大会议。张进煊、陈任生、韩瑶初、赵世尧、李英敏、张世聪、谢王岗、朱明、邹贞业、张九匡、钟高鉴、张书坚、陈业昌、粟稔等出席会议。李士洋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放手组织抗日人民武装的方针和广东省委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精神。会议根据广东省委的决定，成立中共合浦中心县委，领导钦廉四属（合浦、灵山、钦县、防城）党组织。会议选举李士洋、张进煊、陈任生为县委常委，韩瑶初、赵世尧、李英敏为委员。县委分工：书记李士洋，民运部部长张进煊，组织部部长陈任生，宣传部部长韩瑶初，武装部部长赵世尧，青年部部长李英敏，粟稔协助搞宣传工作。中心县委机关设在廉州儒家巷蔡屋。中心县委成立后，3月，派黄文楷到钦州师范教书，开辟钦县工作；9月，派钟高鉴到钦州师范，成立党小组；10月，钟高鉴回合浦汇报工作经领导同意不再去。在合浦县境内，建立西场、公馆两个区委和北海特别支部。公馆区委书记邹贞业，西场区委书记朱明，北海特支书记由赵世尧兼任。随后，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又成立廉北区委，领导沿海的廉州、北海、南康、福成、白龙等地的党组织。区委书记庞达（庞继业），组织委员郭芳，宣传委员庞自。中共廉北区委管辖廉州支部、合浦一中大石屯支部、北海学生支部、白龙支部、龙潭支部、乃沟支部、南康三中支部和常乐多蕉支部。

中共合浦中心县委的成立，使钦廉四属地区党的领导有了坚强的保证，一度受到国民党顽固派摧残破坏的党组织得到了重建和发展，合浦中心县委就是轴心，钦廉四属各地抗日救亡运动有了统一领导的政治核心，从而使合浦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在党的统一组织领导下逐步走向高涨，并推动合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第二节 抗日救亡运动的全面高涨

中共合浦地方组织是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和马列主义传播的基础上重建的，党的重建和发展，又进一步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8年，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广东党组织的实际，在确定党的工作策略时明确指出：党的群众工作以合法方式进行；不以争取党的政治口号为主而以争取党的顺利工作条件为主，党不成立单独的群众团体，以积极参加当局领导的团体及所号召的运动为

主，在这些团体中掌握实际的领导权。虽然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得到实现，国民党被迫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是，由于合浦是国民党统治势力强大的地区，而初建的合浦中心县委则处于发展状态，需继续保持秘密工作。中心县委认真贯彻省委的指示精神，要求党员到乡村、学校，到各行各业的群众中去，宣传抗日，使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深入，在此基础上发展党的力量。

1938年初，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合浦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也日益高涨。

廉州中学、合浦一中等校学生的抗日宣传工作

廉州中学是合浦的重点学校，是青年学生最多的地方。抗战开始时，廉州中学校长蔡振玮、教务主任韩朗周、训育主任张存芳都是开明人士，还有一批进步教师，他们支持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允许学生读进步书刊，因而学校的学习和抗日宣传工作都很活跃。进步的青年学生最容易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纲领和主张，他们在国难当头，勇挑重担，在该校组织晨呼队、歌咏队、宣传队，开展蓬蓬勃勃的抗日宣传活动。天刚破晓，便有一批批晨呼队走上街头，一面唱歌，一面高呼口号，惊醒在梦中的人们。一到晚上，十字街头、广场上、公共场所里，到处有宣传队高唱抗日救亡歌曲，演抗日街头剧，宣讲抗日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号召大家行动起来，抗日卫国保家乡。

抗战开始的第一个学期，廉州中学共组织3批下乡宣传队，深入各圩镇和农村宣传，每批下乡都是10天左右。第一批由美术老师严治平当队长，带领辛莽（吴裕春）、张文纲、黄国栋、罗永玑、谢有干（谢潼关）、杨世昆、易志贤（绰号“大喉咙”）、陈传讚等10多人组成一个队；由学生朱兰清当队长，带领许家骅、邱鸿就、林昆、李廉东（李辛农）、何超华、苏善卿、李廉正、王宗绵等10多人组成另一个队，深入党江、乾江一带，在收割中造稻谷的田间地头进行宣传活动。宣传的主要内容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揭露日军侵略的野心和残暴的罪行，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抗日保家卫国；演唱抗日歌曲《在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大路歌》等；还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他们一边帮助群众劳动，一边进行宣传，方式很灵活，宣传效果很好。

第二批下乡也是2个队，一队由朱兰清任队长，带领原班人员到闸利（闸口）、公馆、白沙、山口一带圩镇宣传；另一队由罗文洪（周崇和）与罗永玑负责，也是原来那班人马，到张黄、小江、福旺一带宣传。由朱兰清带的宣传队还和公馆五中师生（抗日救亡骨干、积极分子）举行了一个抗日救亡工作座谈会，在公馆五中任教的李英敏和学生张九匡也参加座谈会。大家互相交流经验，汇报情况，相互激励，相互鼓舞，共同搞好抗日救亡工作。

第三批下乡宣传队一个队到石康、常乐、多蕉等圩镇宣传，另一个宣传队前往上洋、沙岗、西场等圩镇宣传。

这个时期，在廉州中学里，不管白天或黑夜，嘹亮而雄壮的歌声，经常在天空中荡漾，一首新的抗战歌曲刚问世，马上就由歌咏队队员教同学们唱。当时廉州中学抗日救亡运动，热火朝天，越烧越旺，许多不参加下乡宣传的同学，也参加街头宣传和晨呼队，或办识字班、夜校等。有些班级变成停课状态，不少教室成了宣传节目的排练场，或者成了宣传队开座谈会、汇报工作、总结经验等的场所。在廉州中学校门的墙壁上，由辛莽仿效毛泽东为抗大制定校风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8个大字写成美术字，同学们受到了这几个字的精神熏陶，自觉严格要求。到了年底，学校组织各地寒假返乡宣传队，以各个圩镇为中心，属哪个地区的同学便参加哪个地区的宣传队，回乡后，宣传队白天举行街头宣传，晚上在街头演出，全县的重要圩镇基本上都有廉州中学抗日救亡宣传队的足迹。

1938年春节刚过，廉州中学学生（也是宣传队的积极分子）辛莽、邹瑜、李廉东，为了追求更高的革命理想，他们投奔到党中央所在地——陕北延安。此事对全校同学的思想革命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此后还有两批廉州中学学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如易治仁、凌瑜等，还有一个叫罗进烈的学生在途中牺牲了。就在这个时候，张进煊回廉中执教，开始建党工作，一批优秀的救亡工作骨干，都先后参加共产党，成了中共合浦地下党组织的中坚力量。党组织建立后，加上党的领导骨干中有一批是廉州中学的师生，有力地领导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使抗日救亡运动更加蓬勃发展。

抗日救亡剧运的发展

在合浦一中，早有一批进步学生在抗战开始就积极组织起来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当时一中校长劳开连不干预学生读进步书刊，赞成学生做抗日救亡工作，校内还有庞达、郑樵秀等进步教师，因而抗日工作的开展比较顺利迅速。先是一些进步学生在校内出墙报宣传抗日，到北海街头和附近农村开展宣传，教唱抗日歌曲，开办夜校。1937年冬，组织合浦一中抗日宣传队，推举耿宪修为队长。主要成员有吴世光、郭芳、庞自、卢传义、谢王岗（谢祖佑）、宋家培、李山（李卓兴）、罗英（罗永瑛）、陈廷瑞、利培凤、岑嘉毅、黄翠玉、谭承裕、伍朝汉、卢文（卢雄声）、仇乃梁、陈莲珍、邓爱莲、黄翠琼、利培源、罗永莹、黄贤（黄翠英）、何正四、何国达、苏少林、王幼茜（黄家秀）等近30人。第一次下乡是通过黄翠玉找普益汽车公司经理黄作兴（翠玉的父亲），以1/4的票价雇用该公司的一辆大客车，到石康、常乐、旧州、张黄、白石水、武利、檀圩、灵山等地，用口头、文字、歌咏、戏剧、漫画等方式开展抗日宣传，演出短剧《保家乡》《林中口哨》《三江口》《秋阳》《铁蹄下》等，到张黄和农职校学生及灵山青年开座谈会和联欢会，历时20多天，回校受到校长等人的表扬。跟着，是第二次下乡，到西场、上洋、沙岗、总江口等地，去了10多天。第三次是1938年春，到闸利、公馆、白沙、山口。第四次是到南康、福成、白龙等地。1938年秋，高中二、三年级去恩平集训。广州失守后，合浦一中学生以回乡抗

日保家乡为号召，到张黄、龙门、小江、福旺、寨圩农村去对农民开展抗日宣传（这几次都是步行的）。随后，回到小江长塘山，对附近一带的苏村水、六流水、云坊水、街口坡的农民，以办民校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组织工作。1937年和1938年的寒暑假期间，合浦一中和廉州中学的学生，还以同乡的关系组成返乡宣传队，回到家乡开展宣传。

1938年暑假，合浦一中部分学生留校组成战地服务团，到地角、冠头岭慰问驻军。日军飞机轰炸时，动员指导群众疏散和做救护工作。组织团员学习军事知识，举行野营和夜行军、夜间作战等演习。9月，日军第一次占领涠洲，很多人逃难到北海，一中学生组织人员到他们当中做宣传工作，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日军退出涠洲后，一中学生派人参加慰问团到涠洲慰问受害群众。1939年11月，日军在钦防登陆，北海紧张，一中部分学生组成学生队，在沿海帮助防守，在市区防奸防匪、维持治安，还有部分学生到龙潭等地做农村工作，组织抗日联防队，准备在那里建立抗日据点。

参加抗日工作的学生，在工作之余都抓紧时间学习革命理论，研读抗日书报，学习军事知识和群众工作方法，开时事讨论会，排演抗日话剧，教唱革命歌曲，生活紧张热烈。抗日宣传队和救亡团体，成了新型的培养革命分子的学校。

抗战开始后，县内的合浦三中、合浦五中、寨圩简易师范学校的学生都纷纷组织抗日宣传队或救亡团体，到附近或各乡镇去进行抗日宣传，全县掀起了抗日宣传的高潮。

抗日救亡话剧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最重要宣传形式。合浦的进步青年和学生在街头、农村的抗日宣传中，以自己的文艺天赋，在文艺舞台上充分展示戏剧才华，他们的抗日救国激情在广大民众中引起了共鸣，不少人在观看中悲愤泪下。

早在1937年春，廉州中学一群曾参加马列主义读书会，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学生，推动学校组成抗日救亡的话剧队和歌咏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抗战开始后，1937年9月初，廉州中学的学生罗文洪、朱兰清、罗永玑、林昆、辛莽、莫维沛、黄永寿等10多人，联名向学校写报告，要求成立廉中抗日救亡工作团。这一报告得到爱国民主人士蔡振玮（校长）、张存芳（训育主任）、韩朗周（教务主任，又名韩罕明，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当即组成了全校性的救亡工作团。韩朗周和教师严治平、学生朱兰清、罗文洪、伍雍谊、黄国栋、张文纲、杨世昆、罗永玑、辛莽、钟高鉴等为工作团的骨干，下面分设戏剧、歌咏、漫画、文字、口头等宣传队。戏剧宣传队以罗永玑、黄永寿、黄锴章为基本队员，吸收爱好演戏的同学参加，由对戏剧有研究的韩朗周指导。首先排练了《放下你的鞭子》《拾黄金》和韩朗周编写的《丰收之后》等街头活报剧，在街头演出。此后为演出大型的救亡剧目，吸收更多的学生参加，改称廉中剧团。

廉中剧团为纪念九一八事变，在廉州公演国难三部曲——《父子兄弟》《梅世均之死》《血洒卢沟桥》，从9月18日晚起在骊珠戏院连演三晚，观众拥挤，场场满座。10月10日又公演《高压下》《塞外的狂涛》两个独幕剧。廉中剧团在韩朗周的指导下，还先后演

出过《旧关之战》《三江口》《浮尸》等救亡剧目。10月30日晚，廉中救亡工作团在廉州孔庙前举行规模较大的综合性的宣传晚会，演出凄楚而又扣人心弦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观众的情感由悲凉而转为激昂奋发。此外还有激动人心的演讲，有雄壮的歌曲《保卫我们的北海》，等等，孔庙面前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1938年春，罗文洪、王克等在廉州发起组织大众剧团，许家骅、谢兰仪等组织烽火剧团，进行演出活动。继而在廉州组建起来的戏剧团体还有海中剧团、少先队剧团和附城小学教师戏剧队等。各剧团（队）演出的剧目有《八百壮士》《浮尸》《春风秋雨》《卢沟桥之战》《血债》《帮助游击队》《野孩子们》《铁蹄下》《太阳旗下》《民族公敌》《回头》《东北之家》等，救亡剧运在廉州盛极一时。

北海的救亡剧运也在七七事变之后勃然兴起。约9月间，合浦县立第一中学的进步学生同时组成两个剧团：一个是高中学生的怒吼剧团，主要成员有耿宪修、谢王岗（谢祖佑）、卢传义、李焯兴（李山）、陈廷瑞、利培凤、黄翠玉、陈莲珍、苏少芳等，耿宪修为团长，演出《张家店》《秋阳》《林中口哨》等救亡话剧；另一个是由初中学生组成的儿童剧团，陈祥军任团长，苏迈（苏秀远）任秘书，团员有苏文绵、杨衍汉、王朝明（王振瑄）、郭洛（郭庆堂）等二三十人，由童军教练庞达（庞继业）领导，郭芳、利培源等具体指导排练。该团先后在校内外演出了《古庙钟声》《小英雄》《小渔夫》等救亡剧目。与此同时，北海进步青年发起建立了海燕剧团，苏翰彦任团长兼导演，符平（符汝瑜）任剧务，团员有周志刚、张文纲、陈英然、何国达、潘伟德、林振仁等30多人。首演话剧《黑地狱》，效果很好，在北海轰动一时。接着演出《血祭中秋》（苏翰彦编剧）、《春风秋雨》、《飞将军》、《夜光杯》、《咆哮的河北》、《八百壮士》、《塞上风云》、《浮尸》等大中型救亡话剧，一样闹得有声有色。

廉州中学和合浦一中的抗日救亡宣传队多次下乡巡回演出，把救亡话剧带到圩镇和农村。

1937年11月初，时值秋收，廉州附近的党屋（党江）、乾体（乾江）的田野上，农民正忙于收割水稻。廉州中学救亡工作团组成两个宣传队，分赴党屋和乾体，在田野上一面帮助农民收割，一面进行宣传。前往乾体的宣传队由教师严治平带领，队员有辛莽、张文纲、黄国栋、罗永玑、罗文洪、杨世昆、陈传讚等。前往党屋的宣传队由朱兰清带领，队员有许家骅、邱鸿就、林昆、李廉东、何超华、苏善卿等。宣传队利用农民劳动的间歇时间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并用歌咏、演讲等形式进行宣传。廉州中学救亡工作团先后组织几批下乡宣传队，分赴闸利、公馆、白沙、山口、张黄、小江、福旺、石康、常乐、多蕉、上洋、沙岗、西场等圩镇宣传演出。队员们怀着抗日救国的热情，不辞劳累步行下乡，生活虽然艰苦，但演出却十分认真，效果很好。第二批前往石康演出的队员有罗文洪、邱鸿就、王琼儒、王瑶儒、黄绍琪、易志贤等，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流亡曲》

《前车可鉴》等剧目。演《流亡曲》时，罗文洪扮老爷爷，王琼儒扮媳妇，黄绍琪扮孙子，歌声悲凉感人，当唱到“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时，媳妇哭了，老爷爷也哭了，全场的观众都哭了。

1937年秋，合浦一中的进步学生庞自、谢王岗、岑嘉毅、谭承裕、宋家培、陈莲珍、黄玉金、苏少芳、罗英、利培源、黄翠玉、苏少芝、苏少琳等组织救亡宣传队，争取到学校的支持，学校派郑樵秀老师领队。一部分队员在北海街头、外沙、地角和高德等地宣传和演出；一部分队员沿公路北上，到石康、张黄、小江，后转回乌家、上洋，再往灵山等地宣传演出。宣传方式除了演话剧外，还写标语、发传单、出墙报和演讲等。

1937年冬至1939年夏，县属各中小学校的救亡宣传队、青年抗日先锋队的救亡宣传队和抗敌后援会的救亡宣传队，都把救亡戏剧作为重要的宣传手段之一，使救亡戏剧遍及穷乡僻壤，山隅海角。廉州中学仅在1938年暑假以学生籍贯为基础就组织了18个回乡宣传队，在18个乡镇里进行戏剧、歌咏等宣传演出活动。

廉州抗先队宣传队30多人，由李英敏、王文崑带领前往福成、南康、闸利、石康、白花塘（石湾）等圩镇巡回演出，演出《送哥去打鬼子兵》《狠打鬼子》等剧目。

1938年冬，廉州中学抗先队队员钟高鉴、伍雍娴、王瑶儒、蔡起惠、张文纲、黄兆明、王宗绵、何超华、邱日光、陈裕平、孙业武等12人，组成精干的宣传队，钟高鉴任队长兼党小组组长。这支抗先队宣传队先后前往石康、常乐、多蕉、旧州、张黄、龙门、小江、北通、古立、三合、福旺、寨圩、土东、乐民等地演出《火焰》《太阳旗下》《夜之歌》《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等剧目。巡回演出历时两个多月，由于不断地演戏、唱歌和演讲，好些队员的嗓子都嘶哑了。

1938年11月，中共合浦县工委为了更好地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组办两个宣传工作队：一个是合浦县民众抗敌后援会战时工作队，另一个是合浦县民众动员委员会战时工作队。这两个战工队每队30多人，共产党员张进煊、卢传义、黄坚、何正四和进步学生郭洛、王朝明、梁国珍、俞永贞、杨衍汉、王振英、劳炳光、罗家英等参加后援会战时工作队，罗家英任队长，卢传义任副队长，张进煊任指导员。共产党员利培源、劳锡景、王惠澜、李华良、进步学生王尚业、陈祥军、苏善卿、包福贞等参加民众动员委员会战时工作队，王尚业任队长，利培源任副队长，张进煊任指导员（张进煊任两队指导员，卢传义任两队党员组成的党支部书记）。两个战工队在县属37个乡镇巡回演出救亡话剧和演唱救亡歌曲。

从属抗敌后援会的西场青年抗敌同志会（简称青抗会）的戏剧演出活动也十分活跃。青抗会由共产党员朱明、罗刚、黄模等领导，他们在农村发展了10个青抗分会，会员达400多人，开展军训和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下半年，青抗会的戏剧演出由王克领导，曾在西场圩镇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及几个自编的剧目，经常深入西坡岭、那隆、老温垌、

东坡、茅坡、卸江等农村和沙岗、乌家、那丽等圩镇演出。在钦县那丽演出后，宣传队队员集体攀登云雾缭绕的那雾岭，他们登高远望，豪情满怀地相互勉励：“如果日军一旦打来，就上山打游击！”他们还组成晓钟剧团，演出大型话剧《凤凰城》，曾前往县城廉州公演，得到观众的好评。

与此同时，南康进步青年杨永懋、詹树仁等组织民众剧社；合浦三中进步学生组织血花剧社，在南康街上演出救亡粤剧和话剧；合浦三中学生还组成儿童“市政府”（救亡团体名称），演出话剧《汉奸的下场》等。

1939年3月，廉州中学迁往小江镇，该校党组织为了发动合浦北部山区的民众抗日，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经常举行大型文艺晚会（约两周举行一次），向群众演出救亡话剧和歌剧。演出地点是小江圩上的大戏台和近郊一个平坦的山坡上，每次演出都聚集几千名观众，十分热闹。学生在韩朗周的指导和影响下，对演戏有着浓厚的兴趣。当年夏天，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以年级为单位，进行戏剧演出比赛，结果高二级（含师范班）由伍雍娴、王宗绵、黄兆明、王琼儒、蔡起惠等主演的《黎明》（陈荒煤编剧）获得冠军。

1939年暑假，廉州中学和合浦一中学生都组织回乡宣传队进行演出活动。公馆片由钟高鉴领队，队员有徐汝竑、王琼儒、徐永源、陈铭洲、陈琪、陈广芳等，他们前往公馆片各地宣传和演出《流亡曲》《前车可鉴》《火焰》《太阳旗下》《夜之歌》等救亡剧目。南康片由陈冠庸、卢文、邓松、邓登、陈莲珍、邓爱莲等组成宣传队，返回南康进行宣传活动。

随着各种宣传队在各地交叉频繁演出，救亡戏剧的演出形成热潮。这一热潮后浪推前浪，波翻浪滚，荡漾在六万山地区，对于唤醒民众抗日和建立游击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1939年冬，日本侵略军在防城、钦州登陆进占南宁。1940年1月，驻防在钦灵交界的国民党一七五师巢威团和南三游击队在四峡坳英勇抗击日军，获得毙敌340多人的胜利。消息传到廉州中学后，师生们纷纷要求组织战地服务队到前线慰问抗日战士。在廉中以教学为掩护的中共合浦地下党领导人张进煊以及爱国民主人士廉州中学校长蔡振玮、教务主任韩朗周，在学生中抽调抗日救亡积极分子组成30多人的廉中战地服务队。参加服务队的有王琼儒、蔡起惠、王瑶儒、王碧儒、孙业武、陈裕平、林怀君（工友）、陈冠庸、黄兆明、苏如如、苏建贞、韩丽英、曾日慧、邱日光、王宗绵、苏善卿、宋稚槐、杨永文、杨永武、杜振蓉、蔡蔚若、朱家英、黄蔚兴、黄暝兴、黄葆兴、张庆鼎、王廷林、邓爱莲、王献元、钟清彰等。他们在韩朗周的带领下，冒着严寒，奔赴前线，到达灵山的陆屋、旧州时，听到远处隆隆炮声的队员们，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奔赴战地，为战士们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流亡曲》等文艺节目，还到连队帮助战士写家信、缝补衣服、洗衣、理发等，全心全意为战士服务。有时晚上到部队营地演出，演完节目整队返回时已是深夜，有一天晚上，天黑路滑，走了许久还不到住地，大家越走越急，又不敢打手电筒辨认方向，怕招敌人炮轰，最后躲进一山沟打亮电筒拿出地图进行分析，才发觉走错方向，险些误进敌人

的阵地。这一晚由于来回奔跑，回到住地天已亮了。廉州中学战地服务队在军队驻地巡回演出和服务长达一个月，直到寒假结束才收队回学校。

1940年4月，合浦三中在该校中共支部的推动下，以学生党员为骨干，吸收部分进步学生，组成10多人的南康各界前线慰问团。成员有陈耀琪、许维芳、廖世华、李洵祥、邓其英、冯训庠、李廷煊、钟逢显、龙绍庆、姚富厚、黄继莲等，由该校校长、进步人士吴定远率领，前往钦灵抗日前线慰问抗日战士，他们特地经过北通，在那里买了几担熟烟丝作慰问品。慰问团到灵山三海岩国民党二十六集团军总部，受到蔡廷锴将军的接见，先后在灵山、烟墩、陆屋等地为战士们举行文艺晚会，演出《送郎出征》《救亡哑剧》等节目，还给战士们分发带去的烟丝，真是“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战士们对此十分感激。

学习革命理论的热潮

抗日战争关系国家民族和每个人的命运，扣动着人们的心弦。日军的飞机轰炸，海面的军舰炮击，迫使合浦学生和社会青年面对生死存亡的现实。抗日战争将如何发展呢？抗战能否胜利呢？如何争取抗战胜利呢？国家民族将来怎样呢？青年的前途如何呢？这些现实、迫切而又重大的问题，引起他们的思考，需要寻求解答，从而促使这些青年人去学习理论，追求真理。抗日救亡的宣传，要有能说服群众的道理，有多种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与形式，也促使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加紧学习。抗日开始时，战争形势的紧张，国共合作的建立，共产党的影响和力量的迅速扩展，国民党对新形势缺乏估计和准备，思想统制还没有完全搞起来，给进步思想的发展造成有利的时机，从1937年夏到1939年夏，在合浦各中学和社会青年中，发展起一股学习革命理论的热潮。

那时，在廉州中学、合浦一中等学校中，各班都有读书会，很多人阅读革命书刊，经常开时事讨论会、学习讨论会，出墙报、油印刊物，研讨抗战形势、抗日问题，交流学习心得，讨论学习中的问题，或写诗歌、散文，举行论文演讲比赛，开诗歌朗诵会，搞得很活跃、很热闹。

在1937年夏至1938年夏，这种学习大体处于自发散漫状态，各人对哪一方面有兴趣就学习有关的书刊，能找到什么书刊就读什么，哪些人对什么问题有兴趣就聚在一起讨论、研究，或建立某个团体。1938年春夏间，各校开始建立党组织以后，就通过党员加以引导，使学习趋向如下几个方面：抗战形势与党的政策、马克思主义理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革命问题、党的建设等。阅读的报刊主要有延安出的《解放》杂志、武汉（后在重庆）出的《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广州（后在桂林）出的《救亡日报》。抗战形势与政策学习的书籍与文件主要有毛泽东著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朱德著的《抗日游击战争》，罗瑞卿著的《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吴克坚著的《统一战线教程》等。马列主义理论书籍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著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著的《反杜林论》，列宁著的《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斯大林著的《列宁主义概论》《列宁主义问题》，《列宁主义初步》，《什么是列宁主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列昂节夫著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社会科学概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主要书籍有罗曼·罗兰著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邹韬奋著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中国革命问题的主要书籍有《西行漫记》《从东南到西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等。党建问题（主要给入党教育对象学习）的主要书籍有《论政党》《论共产党》《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著）等。国际问题有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反战反法西斯斗争的当前问题》。当时一些新小说如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苏联的《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夏伯阳》《被开垦的处女地》等也很受欢迎。在学习的过程中，张进煊、赵世尧、陈任生等常给一些阅读的学生做辅导或问题解答，同学间经常互相商讨，不时开读书讨论会交换学习心得及研究疑难问题，使学习者渐感兴趣，逐步深入，学有所得，培养出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人。党组织便在这基础上挑选有条件入党的人，进一步加以个别的、秘密的党的知识和党员条件的教育，然后个别吸收入党，那时叫作“大锅炒，选熟了的挑”，给党组织的发展造就很有利的条件。

当时，北海有两间书店，一间叫强新书店，一间叫日新书店，看到进步书籍畅销，都通过海轮从上海买回新书销售。上述书籍绝大多数都在这两间书店公开销售，只有《论共产党》等一类书是秘密出卖的。在日本军舰完全封死北海港以前，英国太古号轮船定期经越南西贡、海防到中国北海，再往中国海口、香港、厦门、上海，直到苏联的海参崴，不受国民党当局检查。北海日报社的罗家伟、陈仲梧等便通过这条线路，从海参崴购回苏联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列宁选集》（20卷本，只买到部分）、《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问题》（精装本，封面写《理论与策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李立三等在巴黎办的《巴黎救国时报》等，在报社内秘密销售，有的用很薄的道林纸印成64开本，便于秘密收藏和携带。因此，在抗战初期，北海青年能读到的马列著作比其他地方多，印刷也很精美。

在1938年至1939年夏，合浦读革命书籍风气最浓的两间学校是合浦一中长塘山分校、寨圩简易师范学校。

合浦一中因北海校舍受日军飞机炸毁，1938年冬迁校到小江长塘山宋屋祠堂。当时到那里的师生有100多人，学校派教务主任谭志伟负责，他思想较开明，不干预学生的学习和工作。教师中有党员陈任生、韩瑶初（均为县领导），宁德棠不久也入了党，王普远思想也较进步。学生中有党员谢王岗、宋家培、岑嘉毅、李山、谭承裕等，他们建立了一个

支部，谢王岗任支部书记。合浦一中抗日宣传队30多人，到寨圩等地宣传后回到这里，随即成立合浦抗日先锋队一中支队，推选谭志伟为支队长，谢王岗为秘书兼政治部部长，耿宪修为军事部部长。时值寒假期间，学校尚未正式开课，由陈任生等倡导开设几个革命课程：陈任生主讲《论持久战》和统一战线问题（宁文参加讲后者）；韩瑶初讲革命的三民主义；一位姓张的老师讲中国近代史。讲完后由学生讨论，提出问题再作解答。时事问题由大家讨论，先后举行过三次全校性的大讨论：第一次讨论的主题是日军占领武汉后，今后的主攻方向是大西南还是大西北？会上有两种不同意见开展了尖锐的争论，没有取得共识。第二次讨论的主题是汪精卫投敌对抗战和国内政局的影响，如何开展反汪运动？第三次讨论的主题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当前的任务是什么？学生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除三次大讨论外，同学中遇到时局和学习中的各种问题也分别在不同范围内讨论。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新华日报》全文刊出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报告《论新阶段》，合浦一中党组织即决定用油印翻印。当时的条件，油印只能印500份，便印500本，由耿宪修、岑嘉毅等人刻蜡板，学校油印室负责印刷。印出后，学校师生每人发一本，其余出售收回成本，很快销售一空。随即组织全体学生学习，请陈任生、韩瑶初做辅导讲解，讲后讨论，使人人领会其精神。此事产生重大的影响，引起合浦国民党当局的震动。

学校在大厅的一头设有一个图书室，室内有《解放》《新华日报》《群众》《救亡日报》《全民周刊》等报刊，还有各种进步书籍，阅读的人很多，不时交换心得，讨论问题。很多学生自带的革命书籍，虽不公开摆出来，但同学之间都可自由借阅。

合浦一中学生除了学习革命理论，也很重视学习军事，以抗日游击战争和游击战术为主，研究游击战、学习射击，利用地形地物散兵作战，每天都跑步、爬山，不时举行夜行军和作战军事演习，每天早上用半个小时教唱新的革命歌曲。在学习之余还安排不少时间排练话剧，到各处去演出，除独幕剧外，曾排演过三幕长剧《流寇队长》，公演后得到好评。

学生们还安排一定时间到附近村庄办夜校，对群众进行文化教育、抗日教育、革命教育。每周都定期到苏村水、六流水、云坊水、街口坡、茅坡等地做群众工作，准备把这些地方作为游击根据地。

合浦一中分校曾和迁到小江的廉州中学师生、寨圩简易师范学校师生举行过两次联欢和工作经验交流会。

在那一段时间，一中学生支部教育吸收卢文、何国达、邓松、宋德驰、林富山等人入党，培养了一批教育对象。

合浦一中长塘山分校因此名声远扬，各地的进步青年纷纷前去参观学习，被誉为“南方抗大”，但也被国民党顽固派扣上“赤化”的帽子，要加以处置。1938年冬，合浦一中

校长周胜皋任国民党合浦县党部书记长（仍兼合浦一中校长），地位变化了，思想也随之变化，他不能容许长塘山分校继续那样发展下去。1939年春，决定在廉州总江口附近的大石屯另办分校，由派反动分子杨超兰主持，高中部设在那里。高中部学生如不到大石屯的，转到廉州中学借读。1939年3月，党组织决定，派陈任生到大石屯分校任教，卢文、伍朝汉、仇乃梁等人到大石屯高中部读书，其他高中生都转往廉州中学借读。当年6月发生“儒家巷事件”后，长塘山分校随之取消。

寨圩简易师范学校是一间只有初中部的师范学校，校长覃炳璋倾向共产党，积极支持革命，支持学生搞抗日运动和读进步书刊，1937年暑假，他到广州请进步分子卢璧光到校任教导主任。卢璧光主张让学生读进步书刊，搞救亡工作，他亲自到桂林、梧州买回一批马列著作和《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进化史》等革命书籍，鼓励学生学习。开设时事课，动员学生搞抗日宣传，写文章、出墙报。1938年春，卢璧光入了党，组织上又调党员陈业昌到寨圩简易师范学校，在寨圩简易师范学校发展党员，成立党支部，陈业昌任支书。1938年秋，党员粟稔到寨圩简易师范学校教书，他大刀阔斧改革学校的教育课，把“公民”课和时事讲话改为讲《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进化史》；在学生中系统讲解《论持久战》，使学校形成学习革命理论的热潮。

1938年冬，寨圩简易师范学校成立抗日先锋队，全校师生都参加。卢璧光推动卢氏祠堂购买了一批枪支，支部决定组织师生学习军事，举行夜行军和夜战演习。

学校党支部以简师班实习为由，组织学生到寨圩、乐民、土东等地的农村去办农民识字夜校，通过学文化进行抗日宣传和革命教育，提高农民的觉悟。寨圩简易师范学校学生还在党员老师黄平（黄燕帆）的带领下，到平睦、六硯、福旺、小江、张黄、白石水、灵城、平山、石塘、百合、桥圩等地，用墙报、标语、戏剧、演讲、唱歌等形式开展抗日宣传。

那一段时间，合浦其他各中学的学生和廉北等地的社会青年，都兴起学习革命理论的热潮，从中培养了一批革命分子。

任何巨浪总不免夹带各种杂物，学习革命理论的潮流也一样，它的主流是革命的，许多人在高潮中认真学习，培养起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成为共产党员，献身革命，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有的为革命慷慨地献出了生命。但是，也有一些人把学习作为个人谋利益的资本，当作向上爬的扶梯，学习投机取巧、运用权术、升官发财、鱼肉人民的本领；一些人则把学习作为赶时髦、出风头的手段，常夹着一本或几本厚厚的书，讲几句革命术语，其实并没有学进去，对革命精神一窍不通；还有一些人站在反面，污蔑学革命理论为“中毒”“赤化”“误入歧途”，或是监视、刺探，向反动分子报信，等等。但总的来说，当时的学习是革命的主流，对促进革命力量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反对反动分子李焰生和叶天一的斗争

1938年，中共合浦县特别支部领导了反对反动分子李焰生和叶天一的声势浩大的两场斗争。

1938年5月，国民党在合浦的驻军一七五师政训处处长李焰生，窜到廉州和北海一中演说，胡说日本很强大，我国很衰弱，抗战没有希望，应该适可而止，和日本讲和，实质是主张妥协投降，还诬蔑共产党“没有诚心抗日”，胡说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战场是“游而不击”“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共产党欺骗青年走上邪路”，等等。中共合浦特支针对这些谬论，指示李英敏在由党掌握的《合浦日报》上发表全版文章，指名道姓地加以有力的驳斥，造成社会舆论。同时，通过党员发动廉州中学和海门中学学生以及廉州各小学的师生和一部分工人、市民，在廉州举行有数千人参加的反对李焰生的示威大游行，提出“反对破坏抗战，破坏团结”，还到一七五师师部提出抗议，要求调走李焰生。北海的学生群众也举行大游行响应。在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国民党一七五师不得不调走李焰生，改任较开明的林增华（林从郁）为国民党一七五师政治部主任。

8月，国民党政府合浦县县长邱桂兴（兼驻军团长）免去合浦一中校长劳开连的职务，委派思想反动的合浦五中原校长叶天一来接任。特支获悉后，即布置合浦一中支部动员学生反对，时值暑假，只有战地服务团数十人留校，支部经过研究，作出斗争计划，紧急动员能返校的学生回校参加斗争。支部对全体学生进行工作，揭露叶天一在合浦五中的种种罪行，提出实施抗战教育，反对奴化教育，拒绝反动的叶天一任合浦一中校长，全体学生一致拥护。支部即安排人侦察监视叶天一的行动，动员初中较小的学生持童军棍守校门，不准叶天一进校。叶天一到校门口时，学生就围着他高呼口号：“不准叶天一进一中！”“反对叶天一任一中校长！”“打倒反动分子叶天一！”叶天一不能入校，回旅店时，学生们排队跟在后面高呼上述口号，市民争相围观。叶天一白天进不了学校，侦知同学晚上回家、回宿舍，便在晚上偷偷溜进校长室，学生们发觉，立即赶往包围，他怕学生在黑暗中打他，便退走。这一回，叶天一拿到学校的大印，他便以此出布告招新生。新生考试前一天晚上，学生们把考场的桌椅搬走，搬不走的，全部推翻，洒上水，地板也注水，校外沿街派人站岗，不让考生进入学校。叶天一不能在北海举行招生考试，又出新的诡计，出布告让新生到廉州考试，他以为那里是县政府所在地，北海学生不敢去。合浦一中支部和特支研究，决定进一步开展斗争，由特支派人动员廉中学生和《合浦日报》工作人员配合，并派人做地方实力派邓世增等人的工作。考试前一天，合浦一中党支部组织学生数十人连夜赶到廉州，分布在试场周围，劝阻考生进入试场；已入场的，找熟人一个个点名叫出来，结果考场内只有寥寥10多人。叶天一易地招生的把戏又失败了。接着，特支布置廉中、合浦文化界和社会青年200多人会同合浦一中学生组成联合请愿团，到县政府请愿。邱桂兴提出

派代表进去谈，请愿团推出各方面代表5人进去，大队在县政府门前静坐。请愿代表以叶天一不是正规大学毕业的，不学无术，在五中压制学生抗日，有违《抗战建国纲领》等为由，要求县政府撤销对他的任命，另派能实施抗战教育的有才学的人任一中校长。邱桂兴拒不接受，径自离去。代表们要出门时，门卫拦住不准出，外面的请愿团十分愤慨，强烈抗议，邱桂兴的秘书出来喝道：“你们闹什么！是不是要暴动？”群众更加愤怒，他们高呼口号，强烈要求邱桂兴出来道歉，邱桂兴被迫向群众道歉。群众离开县府后在街上游行，高呼口号直到深夜。第二天，《合浦日报》用大字标题登出《县府扣留请愿学生代表》的新闻，全县各界为之震动。地方实力派的头面人物因为和邱桂兴有矛盾（他是外来人），也支持学生的要求。在各方面的压力下，邱桂兴不得不收回成命，同意由地方推荐一中校长。

在地方人士酝酿推选一中校长的过程中，特支让一中原教师庞达出面，提出三个条件：实施抗战教育、支持学生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聘请进步教师。通过庞达和各方面多次商议，最终确定原五中校长周胜皋出任一中校长。周胜皋上任后，聘请庞达推荐的陈任生、韩瑶初、宁德棠（宁文）为教员，赵世尧为一中图书馆主任，使一中在一段时间内（周胜皋任国民党合浦县党部书记长以前）抗日救亡运动和进步势力都得到蓬勃的发展。反叶天一的斗争也推进了合浦全县的革命工作。

合浦青年抗日先锋队的建立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日军准备向华南进攻。为了打击侵略者，组织青年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广东需要组建一个半军事性质的坚强、统一的青年团体，以统一全省青年运动。于是广州中大抗先、附中抗先、留东学会、平津同学会、救亡呼声社、学抗、青年群社等7个团体联合发起组织广东抗日先锋队，成立临时工委，于1938年元旦在石榴岗露营活动中举行广东抗先成立大会。此后，在广东抗先的统一领导下，全省各地抗先队相继组建起来。抗先是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组织的外围青年团体。

1938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派陈任生从广州回合浦工作，省抗先委任陈为广东抗先驻南路办事处主任。陈回合浦后，通过党组织着手开展合浦抗先的组建工作。

在合浦建立抗先有着较好的思想基础，在此之前，合浦青年抗日救亡运动很活跃，特别是在1938年初中共合浦特支建立之后，派一批党员骨干参加县属各地民众抗敌后援会，以党员或进步青年为核心组成青年抗敌同志会、妇女抗敌同志会等团体，在北海组成的各种抗敌同志会就有10个之多。廉州的妇抗会出色地发动了数百妇女参加救亡活动，组织六七十名女青年进行军事训练。西场地区的青抗会员遍布农村，共有400多人，活动广泛。暑假期间，中共合浦特支举办廉中学生夏令营，为抗日救亡运动培训了大批骨干。

1938年9月11日，日军侵占濠洲岛，残杀岛民100多人，对合浦沿海渔民实行惨无

人道的烧杀、奸淫、掳掠。涠洲岛沦陷后，数千岛民逃离家园，四处流浪。日军的暴行进一步激发合浦青年的爱国热情，“保卫大广东”“保卫大北海”“保卫家乡”的呼声很高，他们纷纷要求参加抗日先锋队，练习杀敌本领，准备迎击日军的进犯。

9月，共产党员李英敏、王文崑、黄文楷等首先在廉州建立抗先队，接着，均安（现总江口一带）、乾体、石康、白沙、小江（包括廉中、合浦一中分校）、寨圩、龙门等地的抗先队也相继组建起来，至1939年初，全县共有抗先队员2000多人（各地青抗不包括在内），各地抗先队由当地党组织指导组建，因此，各地抗先的名称和建制也略有不同。1938年11月，在廉州建立合浦县青年抗日先锋总队，领导全县抗先组织，总队部设在廉州中学。为利于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推举国民党一七五师政治部主任林增华任总队长，国民党合浦县党部书记长周胜皋任副总队长。林、周系挂名的正、副总队长不管实际工作，实际领导权掌握在总队政治部主任李英敏手中，共产党员王文崑、黄文楷、洪廉光、陈传讚、伍雍娴、岑月英和王资桐等都是总队的领导骨干。受抗先总队领导的各地抗先组织有：廉州抗先队，队长黄文楷、副队长陈传讚，下设大刀队，黄文楷兼队长，陈德佑（陈坚）任主教练，廉州抗先队共300人；均安乡抗先支队，名誉队长罗光熊（均安乡乡长），支队长韩雪洲，孙业炳、孙业武、王惠澜等分别负责组织、宣传、救护各项工作，共100多人；乾江抗先队45人，队长严福远；石康抗先队四五十人，队长韩师琪；合浦东三团抗先支队（在公馆），支队长范汝超，副支队长李汉业，秘书邹贞业，陈德新为政治部部长、张九匡为政治部副部长，彭景睿为军事部部长，下设公馆、上廉、六湖、白沙等抗先队共100多人；合浦一中长塘山分校（在小江）抗先支队，队长谭志伟，秘书谢王岗，共100多人；合浦县简师（在寨圩）抗先队，负责人黄平、曾庆彪、蒙英翰、黎善团、谢善炳等，全队130多人；龙门抗先月铲队，大队长刘学凯，副大队长谢兰仪，指导员廖世儒，第一中队队长徐海川，第二中队队长谭家驹，共100人。此外，从属于抗先的还有西场、廉州等少年先锋队，共有三四百人。

《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组织大纲草案》规定：“抗先是一个实行高度民主集权制的半军事性质的队伍，队员必须随时随地学习军事知识和技能，并要武装自己及武装群众。”合浦抗先正是按这一规定，把军事训练作为活动的中心课题。

廉州抗先大刀队积极练武。每天晚上，东镇中心小学的操场上点起几盏明亮的汽灯，大刀队队员怀着对侵略者的义愤，在汽灯下扎马舞刀，教练耐心传授武术，队员顽强苦练。大刀队的练武活动鼓舞了群众，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8年10月的一个晚上，均安乡抗先队同乾江抗先队联合举行夜行军演习。均安抗先队负责人事前征得乡长的同意，在乡公所借来30多支步枪，分给队员进行练习。两支队伍约定时间分别从两地出发，按夜行军的要求要在漆黑的夜里行进，准时于晚上11时许在宝塔山上会师。大家兴奋地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

土去!”口号声震撼山野，响彻夜空。

1939年春节刚过，东三团抗先支队集中30多个抗先骨干到公馆的合浦五中，向当地自卫队借来20多支枪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政治学习由共产党员邹贞业、张九匡等讲课；军事训练由国民党退伍军官负责。生活严肃、紧张，队员集体膳宿，行动军事化。每天清晨和傍晚，五中校园回荡着“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的嘹亮歌声，人人同仇敌忾，随时准备迎击侵略者。

龙门抗先月铲队是在原武术会的基础上改组而成的，向来就有练武的习惯。抗先建立后，队员请铁匠打了几十把月铲为武器，认真练习杀敌本领。

合浦简师抗先队同样开展军事学习的活动。

合浦抗先队员戴臂章、背挎包、束皮带，还有不少队员佩带手枪和手榴弹等武器，英姿勃勃，斗志昂扬。

组织文艺宣传队、举办民众夜校和战地救护等也是合浦抗先队的主要活动内容。为了动员民众抗日救国，抗先宣传队不怕长途跋涉，不辞辛劳，经常徒步下乡宣传。

廉州抗先宣传队在李英敏、王文邕等带领下，自筹经费前往福成、南康、闸利、石康、石湾等圩镇演出，演出《送哥去打鬼子》《四龙聚会》《狠打鬼子》等救亡节目，并同当地的救亡团体交流经验，推动各地救亡活动的进一步开展。有一次在巡回演出归途中，路经白花塘到达鬼地沙滩时，敌机突然来袭，发现列队行进的宣传队，误认为是军队，便轮番俯冲扫射，幸好抗先队员练习防空有素，迅速卧倒，不少子弹从队员身旁掠过，所幸无人中弹受伤。

1938年底，廉中抗先队员组成12人的宣传队（钟高鉴任队长兼党小组组长）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情，先后前往石康、常乐、多蕉、旧州、张黄、龙门、小江、北通、古立、三合、福旺、寨圩、土东、乐民等地巡回演出，每到一地都在墙上刷写抗日大标语、画漫画，上街头演讲，晚上演出《火焰》《太阳旗下》《夜之歌》《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巡回宣传演出历时两个多月。

合浦一中长塘山分校抗先队在共产党员陈任生、韩瑶初、宁文、谢王岗的指导下开展活动，经常深入小江农村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演出救亡话剧，出壁报，办农民识字班。分校党组织通过抗先活动做建党工作，首先在茅坡的农民中发展了党员，建立农村党支部。

公馆、白沙抗先队通过在农村办夜校组织担盐会、兄弟会、同心会，培养和发展一批党员。寨圩简师抗先队通过办农民夜校，在农村建立起秘密交通、情报站。

1938年冬，广州、武汉沦陷后，敌机经常轰炸廉州、北海，许多房屋被炸毁，不少民众受伤、死亡。在这种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廉州抗先队组成救护队，岑月英、伍雍娴、陈

传讚等冒着生命危险带领队员做救护工作。每次敌机轰炸后，他们立即奔赴被炸地区，为负伤的群众包扎，把重伤者送进医院抢救。救护队多次救护受伤的民众，曾从崩塌的房屋中挖出10多人，使之脱险。救护队还积极做好受害者家属的慰问和抚恤工作，为了减少群众的伤亡，在每次防空警报发出后，抗先救护队员就到街上疏散群众，如发现有人留在屋里，便动员迅速离开，并在街上巡逻放哨，防奸防盗。

此外，少先队也做了许多救亡工作。西场少先队员共270多人，建立大队，由共产党员朱明任辅导员。下设锄奸、缉私、防空、军事、募捐、宣传等组。锄奸组对形迹可疑的人跟踪、监视，常到客栈检查，严防汉奸、日谍混入。缉私组设卡检查日货，曾缉获“美人鱼”黑布、煤油和火柴等10多担走私日货。防空组发防空警报和指挥群众疏散等。少先队员们小志气大，劲头足，受到群众的称誉。

一次抗日青年大联合的盛会

在合浦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中共合浦中心县委始终领导着全县人民群众向前冲。为了更广泛发动和团结青年开展救亡活动，授意抗先队和其他救亡团体联合发出关于召开全县青年代表大会的倡议，目的是交流和总结青年抗日运动的经验，鼓舞抗日军民的斗志，进一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倡议得到全县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国民党一七五师政治部主任林增华以及广东省第八区督察专员邓世增也表示支持，中共合浦中心县委的领导人张进煊和赵世尧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为了使代表大会能够顺利举行，避免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对和阻挠，县委领导人决定，为了使其合法化，提出以国民党一七五师政治部的名义主持这次代表大会，并以师政治部的名义邀请合浦县各界上层人物出席会议的建议，国民党一七五师政治部主任林增华欣然接受。应邀出席会议的国民党合浦县党部的反对派虽很不情愿参加会议，但也不敢贸然公开对抗，被迫接受邀请。就这样，一次由中共组织领导策划的抗日青年代表大会以国民党的名义来实施，有利于推动团结抗日。

合浦县抗日青年代表大会于1939年5月4日至6日在张黄初级农业学校召开。中共合浦中心县委领导张进煊、赵世尧、韩瑶初和党员骨干张世聪、王文崑、陈业昌、谢王岗、邹贞业、张家葆、罗永莹、邓筱筠（邓家珍）等出席了会议。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全县各地的抗先队代表、青抗、妇抗代表、部队政工队代表、各中学宣传队代表和其他救亡团体代表以及钦廉四属和廉江、遂溪的抗日救亡团体代表等共100多人。国民党合浦县党、政、军的上层人物林增华、邓世增、周胜皋等也应邀作为大会主席团名誉主席出席了会议。

会场设在农校楼上一个较大的课室里，会场前面挂着“合浦县抗日青年代表大会”的横额。开会时，会场挤得满满的，气氛十分热烈。大会主席团轮流主持大会，一七五师政治部少校科员陈培迪（芦荻）和中共合浦中心县委领导人张进煊先后主持大会，中共党员赵世尧、王文崑、罗英、邓筱筠等先后在会上发言。各地代表分别作了汇报，交流各地群

众抗日救国工作经验，林增华和周胜皋也作了讲话。大会实质上成为中共合浦县地方组织宣传共产党关于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等政治主张的讲坛。大会通过了军民合力惩办贪污、严惩走私、防奸和保卫合浦等有利于团结抗战的决议。

这次大会，由于中共合浦中心县委的精心组织和领导，大批党员积极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会大力宣传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促进了抗日军民的团结，加强了全县青年的联合，使全县以抗先队、青抗队为主体的青年抗日救亡运动更加活跃，把全县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会后，大会的决议立即变成行动，一七五师在南康的驻军和当地救亡团体根据大会决议精神，截获了奸商从石头埠外运资敌大米一船，据此率先在全县展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斗争。这次大会也给国民党合浦当局很大的震动，邓世增认为，没有共产党从中组织和领导，合浦青年运动是不会发展得那么快的，从而决心加强反共力度。

北海学生抗日武装自卫队的成立

1939年11月15日，日军从钦州湾登陆，进攻广西，钦县与南宁分别于17日、24日被日军占领。此时，日军虽然没有占领合浦，但合浦与钦县近在咫尺，加上日军的飞机、军舰不断对北海市区、地角、县城廉州和党江等地进行空袭，对海港进行封锁，合浦的战争气氛日益紧张，北海、廉州市民为避战祸，纷纷向农村或外地疏散，合浦一中也迁到小江和大石屯，合浦随时有被日军占领的危险。但驻扎在合浦的国民党军一七五师，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日军交战，不认真抵抗日军的侵略，于1939年6月撤离合浦，远离抗日前线，留守北海市区的只有一些地方自卫队、治安警察以及一个防空哨所，全部兵力不足200人，战斗力不强，如遇日军登陆进攻，很难抵御。

面临这种危难的处境，中共廉北区委和北海党组织认为，为了抗御入侵日军，必须掌握有自己的武装。他们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力争合浦县第五区署的支持，建立一支抗日武装队伍，保卫北海。1939年11月初，中共廉北区委决定，把尚留在北海的学生、教师和其他社会青年以及国民党一七五师派驻北海的以郭兆荣（中共党员）为组长的工作组组织起来，成立一支以学生为主的青年学生队伍，由区委委员庞自直接领导。为了取得合法地位，党组织决定，由共产党员李梓明、郭兆荣联系国民党合浦县第五区署区员李坚（刘瑞图的秘书），取得李坚的支持，一同向区长刘瑞图说明当前的严峻形势和青年学生的正义要求，并提出建议，由区署提供武器、弹药、给养，由合浦一中组织人员，建立北海学生抗日武装自卫队，一旦日军登陆，即可参加作战，保卫家乡。由于大敌当前，形势紧张，加上李梓明及其兄弟李坚与刘瑞图有一定关系，常与刘瑞图倾谈时事、分析形势，做刘瑞图的工作。因此，刘瑞图同意提供枪支弹药和经费，组建北海学生抗日武装自卫队。

11月上旬，由李梓明、庞自带领拟参加自卫队的全体人员到第五区署召开成立大会，区长刘瑞图出席大会并发表了讲话。刘瑞图在讲话中指出，现在国难当头，北海处在抗日前线，不管什么人、什么党派，只要是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我们都支持。这些话得到了全体人员的热烈鼓掌，全体人员表示拥护。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北海学生抗日武装自卫队，称为合浦第五区抗日武装自卫团学生队（简称北海学生队），隶属合浦县武装自卫团。李梓明为队长，林振仁（国民党员）为副队长，庞自为政治指导员，郭兆荣为宣传员。北海学生队共有60多人（其中共产党员10多人），包括合浦一中学生，青抗会、妇抗会的会员，小学教师，海燕剧团人员和国民党一七五师工作组成员。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学生队建立了党支部，由庞自兼任支部书记。会后，区署即发给学生队45支步枪并配备子弹。学生队虽然挂名在合浦第五区抗日武装自卫团之下，但学生队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党组织是学生队的核心，学生队的主要活动计划都由党组织决定。因此，北海学生队是自中共合浦地方组织成立以后，第一支由党组织领导的爱国进步武装队伍。

北海学生队的任务：一是广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二是协助维护市区内的治安和居民的疏散，防止盗窃、赌博、打架等不良行为的发生；三是监视海面日军的活动，配合地方自卫队随时准备打击登陆的日军。此外，学生队还派共产党员陈文山、张启泰、张家保等到大墩海协助地方自卫队做政治工作，以提高队员们的思想觉悟，增强保家卫国的决心。

北海学生队总队部设在北海警察所（今北海市海城区第二小学内），下设政工组，负责全队的政治工作，还分3个分队。

第一分队部分队员（主要是女队员）驻守队部，协助总队开展抗战宣传及联络、救护工作、维护市区内的治安和居民的疏散。其余队员驻守游泳场，负责监视游泳场一带海面敌情。有一天晚上，日军武装汽艇在游泳场附近，企图作试探性登陆，学生队站岗人员发现后，开枪射击，迫使日军武装汽艇仓皇逃走。

第二分队驻外沙岛，负责监视外沙一带海面敌情。这时，日本军舰经常在外沙海面耀武扬威，有时驶近海岸炮轰北海。队员们面对强敌的野蛮行径，经常在海岸线上加紧巡逻警戒，随时准备还击敢于入侵的日军。

第一、第二分队除了监视游泳场和外沙一带海面敌情，还进行以下活动：

一是进行抗战宣传教育工作。学生队的宣传人员通过刷写标语、出墙报、油印出版《学生队报》等形式，进行抗战宣传教育工作。《学生队报》是三日一期的油印小报，它以共产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方针为指导思想，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分析抗战形势，指导学生的活动，鼓舞教育队员、民众。

二是进行防空救护、防盗防特工作。学生队队员轮流巡视市区，以防坏人乘机入屋偷盗，保护群众财产。每星期六，学生队队员集中学习军事和救护知识，以提高军事素质。遇敌机侵扰轰炸，学生队队员冒着炮火，逐户协助居民疏散掩蔽，协助救护人员抢救伤员，

扑灭大火，保护房屋。

三是密切注意日军的动向，深入了解敌情。学生队平时十分注意日本侵略者的动向，若有日军可能进攻北海的情况，就立即报告学生队总队部。11月中旬，为了配合日军在钦县防城登陆，敌机不断轰炸廉州和北海冠头岭，敌舰不断驶近冠头岭海面游弋，全市处于战时状态，居民和商人大部分已疏散。地角、外沙的渔民也冒险开船逃往外地，市内只有一些警察和自卫队。这时，主要依靠学生队维护治安，掩护群众防空、转移等工作。国民党一七五师撤离北海前，曾计划实行“焦土抗战”政策，在珠海路、中山路几个中心点放置了木柴、禾草、煤油等燃烧物，一旦日军登陆便放火烧街。国民党一七五师撤走时，把这任务交给地方政府。11月14日晚上10点左右，冠头岭防空监视哨来电话报告说：“发现有四五十名日军乘船驶向冠头岭。”区长刘瑞图接到报告后，未作深入了解，就断定是日军进攻北海，于是遵照国民党一七五师的旨意，立即下令秘书李坚通知学生队放火烧街，并催促居民紧急疏散。但是，学生队负责人接到刘瑞图的命令后，没有立即执行，认为放火烧街是关系居民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必须慎重对待，先把情况弄准确再作打算。于是，学生队队长李梓明立即叫区署的话务员曾琳打电话与冠头岭哨所联系，复查核实情况。经一再查询，原来是日军在钦县龙门港登陆，钦县犀牛脚的群众连夜开船逃到北海避难，因此，刘瑞图撤销了放火烧街的命令。由于学生队的努力，北海才避免一场火劫，否则，北海会像长沙那样，毁于一炬了。事后，学生队党支部认为，放火烧街是错误的做法，烧了街，不仅全市人民遭到巨大损失，居民流离失所，无处栖身，也阻止不了日军的补给和进攻。学生队负责人向刘瑞图申述了这种利害关系，并得到刘瑞图的同意，派人撤除所有的放火点，免除后患。

第三分队驻北海郊区东星乃沟村，负责做后方群众工作，准备开辟一个抗日游击根据地。乃沟村位于北海、廉州、福成的交界处，第五区署在那里设有一个物资仓库，存放着一批枪弹、被服等。学生队党支部认为乃沟村是个开展游击战有基础的村庄，因而计划在日军一旦攻占北海时，以学生队为基础，利用第五区署的武器物资，发动当地农民，在乃沟村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学生队刚到乃沟村时，当地群众不了解这些带枪的青年学生，不同意他们进村住宿，只让他们住在村外的一间旧油坊里，面积只有10多平方米，10多个人住得很拥挤。但学生队员热情很高，一住下就立即开展群众工作，向群众宣传抗日，说明来意，并帮助群众挑水、扫地、劈柴，下地干农活，逐渐得到群众理解，知道学生队是为了抗日救国、保卫家乡而来的，便让学生队住进村中的祠堂里。学生队进村后，严格遵守纪律，不损害群众利益。有一次，队员们在擦枪的时候，有一个女队员不慎走火打中禾草棚，草棚起火了，学生队将火扑灭后，向群众道歉，并照价作了赔偿。更使群众感动的是，队员们把带来的不多的药品给患病的村民治病。因此，学生队得到当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接着，学生队

便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战宣传教育工作，举办农民识字班，教群众识字，结合讲述抗日救国保家乡的道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水平；出版墙报，组织少年儿童唱抗日歌曲，鼓舞民众的抗日爱国热情。12月，第三分队队长潘伟德离开乃沟村后，中共廉北区委从合浦战地服务团抽调谭俊到乃沟村担任第三分队队长，并将第三分队党小组改为党支部，由谭俊兼任党支部书记，同时从合浦县城抽调中共党员王文崑、罗志辉到该支部协助工作。党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建立农村抗日游击根据地。谭俊到乃沟村后，深入村里与村民“三同”（同住、同吃、同工作），选择贫苦农民为教育培养对象，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组织，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40年1月，国民党沙岗自卫大队副大队长王国光参与奸商活动，外运大米、桐油等物资资助占据涠洲岛等地的日本侵略者，从中牟取暴利，大发国难财。奸商活动越来越猖獗，造成粮价暴涨，人民深受其害。2月21日，中共廉北区委和西场区委发动反奸商的群众性请愿斗争。北海学生队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连夜奔赴廉州，会同合浦战地服务团等组织，发动群众一起参加请愿。学生队主要负责人公开演说，编写宣传材料，揭露奸商罪恶。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2000多名各界群众到合浦县政府参加请愿行动，县长李本清被迫与群众见面，答应降低米价，查办奸商。

北海学生队参加请愿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合浦县当局的注意，而日军侵占南宁、钦县后没有向合浦进攻，廉北地区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国民党合浦县当局便采取了种种手段，扼杀学生队。国民党合浦县当局先将支持北海学生队的区长刘瑞图调任合浦县参事，改任李本清的亲信潘承奎为区长兼警察所所长，并免去经常与北海党组织接触的李坚五区署职员之职，继而停止学生队的供给，下令解散学生队，收缴学生队的武器，还逮捕了学生队队长李梓明。3月，北海学生队被迫解散。学生队解散后，队中大部分共产党员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转移到农村山区，继续开展抗战工作，其余的爱国青年和学生分别到各地继续坚持抗日救国工作。

西场青年抗敌同志会

西场青年抗敌同志会（简称青抗会）是合浦县民众抗敌后援会在西场的分支机构。西场青抗会的建立，是党领导下的西场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开篇。

抗战开始，1937年秋冬之交，石起、黄模、王贵德等组织部分青年成立一个抗日宣传队。这时，国民党合浦县政府成立合浦御侮救亡会，西场镇镇长颜尚卿也组织成立西场御侮救亡二七工作团（简称“二七”工作团），颜尚卿兼领导，没有固定成员，也无具体工作计划，只是有时逢圩日举行一些集会，便临时拉黄模组织的宣传队写点标语，或教壮丁唱唱歌，动员群众团结抗日的作用有限。

1938年春中共合浦党组织重建后，6月，西场党支部建立。党支部党员罗秉铨、黄模、

劳锦、鲁秉贵、王克、石起、王贵德、吴华英、林国奋、张乾德等人进入青抗会，壮大青抗会。他们利用这个合法组织，放手发动群众贯彻党的抗日主张。青抗会实质上是西场党组织掌握和领导的抗日组织。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青抗会联合“二七”工作团工作，很快发动西场爱国青年（包括教师、学生、市民、工人、农民在内）开展了广泛的爱国抗日活动。

青抗会总会设西场菜市附近的广州会馆内。青抗会制作了会徽、会章、臂章，胸章是该会会徽，图案是圆圈内有一个青年扛着旗，吹着号角，旗上有“西场青抗会”字样，图案还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臂章上印有蓝色的“青抗”二字。

西场青抗会主要骨干除了党支部的党员，还有陈家熙、包恭、黄裕起、陆国强、陈禄纪、包兴文、庞殿勋、温国成、吴际棠、庞玉全（女）、王禄安、黄人川等（这些人除包兴文外，其余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总会分政治部、军事部、妇女部和少年先锋队。总会负责人是罗秉铨；包兴文、王禄安负责办理日常事务；罗刚、黄模负责政治部，主要负责指导政治学习，组建分会，组织抗日救亡宣传；包恭、庞殿勋负责军事部，庞殿勋主管青抗会会员的军事训练、军事演习和防空演习等，包恭负责制造地雷炸弹，准备敌人登陆时使用；庞玉全负责妇女部，廖惠明、黄达英、陆华英协助，主要任务是发动妇女参加救亡活动，办夜校，学习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和抗战有关知识；陈国强、区呈禧、李弟恩负责少年先锋队；李和、封钊爵组织少年儿童队，主要任务是组织小学高年级学生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负责维持社会秩序、防空、锄奸、查缉日货等。青抗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第一步是会员上街头、下农村、海边办夜校、写标语、演讲、唱救亡歌曲、演话剧和街头剧等，以各种形式广泛开展抗日救国工作。

毗邻的沙岗乡青抗会是属于西场青抗总会的分支会，由西场青抗总会统一领导。因中共西场党支部管理范围包括沙岗乡党组织，所以在西场、沙岗两地的街道、重点村庄，如西场的白沙头、芋地坑、茅山、九指囊、野狸水、坑口、上那隆、下那隆、卸江、官井、文屋、裴屋，沙岗的下屯、双文、大山、白沙江、珊瑚岭等村庄都有青抗会宣传队写的标语，画的漫画，出的板报、壁报，有声有色，生动活泼。在屋墙、大树、电线杆、桥栏杆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汉奸！”“起来，宁死不当亡国奴！”“抗日救亡匹夫有责！”标语口号比比皆是。

每逢西场、沙岗集市日，青抗会经常组织街头演说，对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进行愤怒控诉，激发群众对日军的仇恨，号召民众誓死保家卫国，不当亡国奴。除了西场、沙岗，他们还不时到乌家、上洋去演说。

唱抗战歌曲也是青抗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平时除会员集体大唱抗日救亡歌曲外，还分组分批在夜校、街头及演出前后进行独唱及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激动人心的歌曲。少年先锋队的歌咏队也在清晨或晚间，成群结队地高唱抗日歌曲，

高呼口号，进行晨呼、晚呼。儿童们纯洁清脆的稚音、嘹亮的歌声、雄壮的口号缭绕在寂静的夜空和晨曦中，显示出少年英雄的抗日气概。

西场青抗会组织剧队不时上街演街头剧、独幕剧、活报剧，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是主演节目，还有许多剧目都是自编自演，从不同角度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意志，剧目情境是群众熟悉的乡土人情，所以能够引起群众共鸣，受到欢迎。戏剧队除到分会所在地进行重点演出，还不时到沙岗、乌家、上洋和钦县的那丽等圩场巡回演出。1938年上半年，在小型戏剧队的基础上成立“晓钟剧社”，演出大型话剧。第一次在西场镇演出反映东北军抗日不屈精神的大型话剧《凤凰城》，竟引来人山人海的观众。后来戏剧队到合浦县城廉州骊珠戏院挂牌公演，为前方抗日战士募捐寒衣，演出成功，轰动全城。

西场青抗会结合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很快转入实际的组织工作。做在组织工作前头的是开办夜校，把一般流动性的宣传转入固定的深入系统教育，发动农村青年和部分村民上夜校，参加文化学习和时事政治学习。内容以讲解抗战形势、抗战前途为主，主要讲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和北平七七卢沟桥事变，揭露日本要灭亡中国的野心以及日军在各地的侵略和暴行，使大家认识日本侵略者的凶残本质，懂得中国人民必须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说明抗战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讲清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必须全民动员起来，同仇敌忾，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俗地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方针和政策，讲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国革命的主体是中国老百姓，工农大众和知识分子要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军赶出中国去。号召大家要学习革命理论，懂得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通过夜校，很多人都领悟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他们纷纷要求加入青抗会，用实际行动抗日救国。

随着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中共西场党支部（后是区委）分别派出部分党员骨干占领乡村小学阵地，或到重点村庄开办夜校，负责组织青抗分会。从西场二小调出王克、会员吴华英到沙岗小学分别任校长和教师，并组织沙岗青抗分会；莫质卿往西场小学任教；庞殿勋、王贵德往大坑口村建立青抗会；吴际棠往白沙头村建立青抗分会；王禄安、黄裕起往芋地坑建立分会；黄人川往白水井村建立青抗分会；叶崇业往西坡岭建立青抗分会；周杏往茅山建立青抗分会；石起往野狸水村建立青抗分会。这样便使原西场圩的青抗会员由60多人发展到1939年上半年的10个分会，会员400多人。

各分会成立后，派到每个分会的党员骨干，都在自己分会的会员中积极培养发展党员，并将培养的对象安排到分会的领导班子，经过周密的考察和锻炼，培养成熟，先后吸收入党。1939年上半年，西场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4个，党小组8个，分别是：西场中心青抗党支部，党员21人；沙岗青抗分会党支部，党员10人；白沙头分会党支部，党员4人；西坡分会党支部，党员12人；那隆分会党小组，党员7人；茅山分会党小组，党员2人；

大坑口分会党小组，党员 7 人；卸江分会党小组，党员 2 人；茅地坑分会党小组，党员 6 人；野狸水分会党小组，党员 2 人；西场街上车衣工会（集体加入青抗会）党小组，党员 3 人；润珠女子小学（青年教师集体加入青抗会）党小组，党员 7 人。在西场，青抗会会员中的中共党员共有 83 人，占青抗会会员的 21%，而青抗会的党员占当时中共西场区委所辖党员的 87%。

西场青抗会的 400 多名会员，是一批活跃的进步青年，他们满腔热忱，热爱祖国，仇恨敌人，是抗日战争中足以依靠的力量，经过考验培养，其重要骨干基本上都是党员。这样，党的组织就建立在党直接领导的有战斗力的外围组织之中，为党领导当地抗日运动和以后的革命斗争打下良好的基础。

1939 年，按照中共合浦中心县委的指示，西场区委把青抗会建成一支既能组织群众抗日，又有作战能力的武装队伍。西场青抗会着手进行军事训练，庞殿勋当教练，并邀请国民党一七五师驻西场连连长文坚一起训练军事科目，练习夜行军及进行野战演习。与此同时，成立一个 100 多人的大刀队，由军事教练庞殿勋执教。大刀队员早晚手执钢刀或木制大刀苦练功夫，边练边唱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嘹亮歌声和威武的刀法展示了青抗会大刀队的英勇气概。同时，少先队也组织一个大刀队和大人们一起训练，两个一大一小的大刀队所在的训练场上，早晚尘土飞扬。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大刀队员初步学会了各套大刀功夫，随时准备杀敌。

战地服务团的成立

1939 年 11 月，日军在钦县、防城登陆，占领南宁，国民党军队基本撤出合浦，战争的阴霾笼罩着廉（州）北（海）大地。这时，群众疏散，商店关门，学校停课，人心惶惶，迁至廉州附近大石屯的合浦一中也宣布停课疏散。为唤起群众坚持抗日，稳定人心，安定秩序，准备在敌后开展斗争，合浦一中党支部成员罗永莹、谭俊、邓爱莲及廉州地下党组织成员王文崑、庞达、王资桐等，在廉州阜民南路“有生号”研究决定成立合浦战地服务团，领导人为罗永莹、谭俊、王文崑、庞达。战地服务团集中青年、学生在廉州东岳庙学习政治、训练军事，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教育工作，培养抗日骨干力量。这一决定传到北海后，在北海的 30 多个合浦一中学生立即赶往廉州，加入合浦战地服务团。合浦战地服务团有 100 多人，仿照抗日军政大学进行学习和生活。战地服务团设组训、宣传、救护、战地服务等股，过着军事化生活，每周有两三个下午进行军事训练，每天早上唱《抗大校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歌声嘹亮，响彻廉州城上空；晚上下班，战地服务团成员三五成群，或谈心，或探访邻近居民，宣传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战地服务团还设有“救亡室”，由地下党组织及党员提供图书、杂志，其中有《论政党》《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大众哲学》《救亡日报》《新华日报》《群众》等，给战地服务团成员

阅读、学习，并由理论水平较高的党员上辅导课，然后分组讨论。国民党顽固派十分注意合浦战地服务团，国民党合浦县党支部书记兼一中校长周胜皋，合浦县国民兵团团长、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王满儒，合浦县政府秘书王佐彝等经常以“关心”为名，到战地服务团窥测动静。但由于战地服务团的领导和主要成员警惕性高，把一些易引起注意的书籍隐藏起来，使他们的刺探都落了空。

合浦战地服务团积极做好战地服务工作。当时国民党军大部队龟缩后方，只有小部队驻在钦廉线上的乌家圩一带。由于国民党军层层克扣军饷，士兵给养很差，时值严寒，士兵衣被单薄，饥寒交迫。为提高士气，争取他们坚持抗日，战地服务团在廉州镇发动群众，开展捐赠寒衣、慰问前线将士的运动。经过宣传动员，募集了大批寒衣，送到乌家前线劳军，从而大大鼓舞了士气。日军侵占涠洲岛后，为组织教育群众，并与合浦地下党反运米资敌的斗争相配合，战地服务团成员在合浦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参加了要求国民党合浦县政府禁止运米资敌的请愿行动。

国民党顽固派在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方面是一致的，但他们争权夺利，内部又有无法调和的矛盾，都想培植自己的势力，扩充实力。因此，国民党顽固派都想把合浦战地服务团拉到自己的阵营，成为其独家的驯服工具。周胜皋认为战地服务团成员大部分是合浦一中学生，这支力量应当由其掌握。但合浦一中学生不买周胜皋的账，令其想利用战地服务团的图谋落空。王满儒曾帮助战地服务团搞军事训练，并吹嘘三青团是“关心青年”的，因此，王满儒认为战地服务团成员对其有好感，可把战地服务团拉过去成为三青团的势力，但王满儒的美梦亦落空。县长李本清虽是外地人，但其手中有权，便玩弄权术想把战地服务团据为己有。合浦战地服务团领导便利用国民党顽固派之间的矛盾，开展抗日工作。不久，李本清利用特权，要把合浦战地服务团改称为“合浦县动员委员会干部队”，并允许战地服务团派人到县动员委员会工作。战地服务团党组织经过慎重研究，认为不能放松警惕，但如恰当地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会有利于党组织发展自己的力量。同时，县动员委员会顾名思义是动员群众，可以名正言顺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于是，同意战地服务团改名，并派战地服务团领导罗永莹到县动员委员会任干事（战地服务团的其他领导谭俊、王文崑等已调到北海乃沟村或别的地区工作）。战地服务团改名后，李本清以为得计，得意忘形，迫不及待地将其亲信、县动员委员会秘书苏光镇等几个人安插到干部队中去，妄图直接操纵干部队。但是，干部队还和改名前的战地服务团一样工作、学习、生活，坚决执行地下党组织的指示。苏光镇在干部队发号施令不灵，其带来的几个人也被孤立。李本清此举增加了县政府与县党部、民团的矛盾，并且妄图操纵干部队的黄粱美梦彻底破灭。合浦地下党组织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图谋，确保了党对战地服务团的领导权和组织的独立性。

1940年3月，干部队为了组织教育农民，培养和锻炼抗日骨干，派出10多名队员到

南康石头埠，深入附近的卧龙村等村庄，与农民一起劳动，对当地农民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不久，战局缓和，学校复课，干部队的合浦一中学生便返回大石屯复课，后来，在合浦一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顽固派杨超兰的斗争。

合浦一中党支部和廉州地下党组织及时组织和领导了合浦战地服务团，历时四个多月，既宣传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也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推动了合浦地区的抗日运动和发展进步势力。